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

骆冬青 主编

鲁迅研究

朱晓进 杨洪承 唐纪如 / 编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

骆冬青 主编

鲁迅研究

朱晓进 杨洪承 唐纪如 / 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研究 / 朱晓进等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1.3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 / 骆冬青主编)

ISBN 978 - 7 - 101 - 07539 - 7

I. 鲁… II. 朱… III. 鲁迅(1881 ~ 1936) — 人物
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3299 号

书 名 鲁迅研究
编 者 朱晓进 杨洪承 唐纪如等
丛 书 名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
丛书主编 骆冬青
责任编辑 刘淑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3/8 插页 2 字数 33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539 - 7
定 价 46.00 元



总序

骆冬青

一位大科学家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教授，肯定没有上过大学。

准此，亦可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肯定不在“大学”之中。

学者，觉也；大学，乃大智慧、大精神、大境界的象征，是追求真理、探寻价值的心灵，是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和终极之关切，是理念，是神圣，是永恒燃烧的活火！……而不是一种体制、一些场所，更不是学衔、学位、学历的授予地。“大学”之前的“大学”，是孔子、孟子、荀子，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等，等等，他们一个“人”就是一所永远的“大学”。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一所“我的大学”，每个人都应当成立自己的“大学”。只要有求知意志、价值情怀与探索精神，只要崇尚真理、自由、境界，“大学”就不会死。心在，大学在。

大学是精神的修炼，是高深学问的探求，是白发的先生和青春的学生构成的最美丽的精神风景，是“我与你”在“同一个世界”中的“同一个梦想”！是升华的生命意志，是净化的性情气质，更是人类智慧的无穷求索。



当今之世，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面对信息的汪洋大海，传统大学的纸质为主的图书馆正在“宇宙流”一般的电子媒介前黯然失色。人际交往的多种虚实相生的快捷方式，亦将改变传统大学的授受方式——我们都沦陷在“电大”之中。

这种严重的时刻，我们文科专业，更需切问大学何为？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其核心部分是语言、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以经典研读为重要内容，形成充实而又灵动的独特能力与智慧。但是，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在“电脑”天文数字的计算与传输速度面前，许多已经落后。大学，在传承知识的功能外，更应强调的是探索知识、研究知识、创造知识，是“转识成智”，是把“集体记忆”化作“个体”的精神活水和智慧与创造之源；是在“知识”形成的“重演”与创造中，让人类天才的智慧化作人类的智慧与天才！是把“学问”变为动词，把“大学”变为“大学问”的创生地。

如此，每个大学教授都应当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学问”之道，有自己的盖世绝活与独到境界。大学中的“大师”，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都是一所大学。

大学课程中，最为重要的就应当是“专家”课，是“研究”课，是“专题”课，是最重要学术领域最新进展、最高境界成果的“活灵活现”的展示与交融。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名师出高徒”，正在于“名师”能将一切知识资源，精神资源化作研究的独到心得见解，并且形成新的知识、新的智慧、新的境界。其他学科当亦如此。

然而，汉语言文学各学科的丰厚积淀，与自然科学的“后来居上”不同，一切学问都需回到源始处。每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乃至学术思想，都有其“绝对高度”，不同时代之间，是高峰与高峰的关系，是绝顶之间的相视莫逆。因此，诸多研究领域，具有特别的专精与渊博的统一。专家与通人，高明者与沉潜者，“我注六经”者与“六经注我”者，在语言文学研究中各领风骚，都为求学者提供了思想风范和学术高格。竭泽而渔的文献学功夫，灵性充盈的审美感悟，



体大思精的理论思辨，剖精析微的学术探求；在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外别辟的学术新境，自“才、胆、识、力”中形成的各不相同的学术精神……都在“专题研究”的专家课程中得到充分展示。

如此，在大学中“听课”，才是一种必须，才能成为精神的盛宴，才开辟了学术研究的种种路径，才通达由“有”到“无”、由“学”而“问”的神奇地带。

凝聚于这个系列中的，应当是我们推崇的大学精神，是知识与智慧之“问”，是心灵与精神之“觉”。活的课堂，乃是心与心的交融互动，是智慧与智慧的碰撞与激发，是研究过程的创造性重建，是新的学术灵光的闪耀与联翩……这些“可神遇而不可目视”的学术精魂，到了著作中是否还能与我们脉脉相通、心心相印呢？

纸上的课堂，尽管有不在现场，但却是一种更加自由、开放、永久的“在场”。古往今来的学者们，正是借此建构了人类永远的“大学”。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仁，愿以微薄之力，在这个“大宇宙”中建造自己的“小世界”。

希望这个“小世界”能得长久。

2009年4月28日于金陵益疑斋



目 录

绪 论	1
一 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	1
二 鲁迅的人格魅力	10
三 鲁迅的当代意义	27
第一章 鲁迅的人生选择与创作道路	32
第一节 “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1881—1909)	32
第二节 “新青年”的呐喊与彷徨(1909—1927)	42
第三节 “横站”中的苦斗(1927—1936)	50
第二章 鲁迅的文化思想	65
第一节 鲁迅的文化哲学思想	65
第二节 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75
第三节 鲁迅的伦理文化观	86
第四节 鲁迅的宗教文化观	101
第五节 鲁迅的民俗文化观	120



第三章 鲁迅的文艺观	132
第一节 鲁迅的文艺本质论	133
第二节 鲁迅的文艺创作论	148
第三节 鲁迅的文学文体论	170
第四节 鲁迅的文学鉴赏论	183
第五节 鲁迅的文学批评论	204
第四章 鲁迅小说世界的独特叙事	224
第一节 鲁迅小说对传统小说的革命	224
第二节 鲁迅小说的主题意蕴	232
第三节 鲁迅小说的形式特征	246
第四节 鲁迅历史小说的演义与新编	268
第五节 鲁迅小说精品举隅	279
第五章 鲁迅杂文世界的文学意义	302
第一节 鲁迅杂文的文体与时代“诗史”	303
第二节 鲁迅杂文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史的负载	311
第三节 鲁迅杂文艺术的“独一无二”	322
第四节 鲁迅杂文精品举隅	330
第六章 鲁迅散文世界的“生命痕迹”	338
第一节 记忆旧事的《朝花夕拾》	338
第二节 “虚妄与希望”间生长的《野草》	343
第三节 生命中难以忘却的纪念	357
第四节 鲁迅散文精品举隅	360
第七章 鲁迅诗歌世界的“新与旧”	368
第一节 鲁迅诗歌创作的线索	368

第二节 鲁迅诗歌的精神华章	372
第三节 鲁迅诗歌的艺术成就	382
第四节 鲁迅诗歌精品举隅	387
第八章 鲁迅的学术研究	394
第一节 鲁迅的文学史研究	395
第二节 鲁迅的翻译和古籍整理	404
第三节 鲁迅与语言文字改革	410
第四节 鲁迅与自然科学	416
第九章 百年鲁迅研究综述	419
第一节 鲁迅研究的萌芽期(1913—1927)	420
第二节 鲁迅研究的发展深化期(1928—1949)	424
第三节 建国近三十年的鲁迅研究(1949—1976)	435
第四节 启蒙光环下的鲁迅研究(1976—1989)	444
第五节 多维视角中的鲁迅研究(1989—2000)	461
第六节 文化研究中的鲁迅研究(2000 至今)	469
第七节 回顾与展望	474
结 语	480
后 记	482



绪 论

一 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

（一）鲁迅的文化史意义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也许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鲁迅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了。正如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伟人一样，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必然地具有丰富的典型性和“文化史”的意义。可以说，鲁迅的文化思想道路较为充分地代表了20世纪初多数文化人所经历的思想历程。诚如早就有人指出过的那样：“鲁迅的道路，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道路，不断地从爱国主义、现实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①的确，20世纪初一大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沿着一条充满了苦闷与追求、彷徨与抉择、前进与倒退的艰

^① 周扬《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人民日报》1981年9月28日。



难曲折的道路走过来的，他们经受了作为变革时期第一代文化人所必然要经受的痛苦的心灵历程。鲁迅身上具有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共同特征，研究鲁迅有助于我们了解整整一代文化人。

而且，作为文化现象的鲁迅，其本身所显示的中国新旧文化转换期的一些基本特征，也使得对鲁迅的研究成为把握新旧文化转换期重要标记的有意义的工作。“五四”作为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是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机，中国现代文化正是从这里开始了破旧立新的重建工程。如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化转换的伟大时代一样，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鲁迅正是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的、代表中华民族现代文化意识在痛苦中觉醒、促成民族文化转换的一代巨人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以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坚毅的探索精神，以博学多才和非凡的秉赋，无愧地承担起了这个文化转换时期所赋予他的艰难的历史任务。他不仅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且在各具体文化领域里勇于破旧立新，树立起了作为新与旧分野标记的里程碑；同时，鲁迅自身所具有的全部的内在矛盾也无疑在标示着一个特定的文化时代。在多方面探讨了鲁迅的文化业绩、他在各具体文化领域中破旧立新的成就以及他主体方面所包蕴的文化内容之后，我们对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将不会有任何怀疑。

与任何一个文化史上的巨人一样，鲁迅的文化意义绝不仅仅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还属于他以后的时代。鲁迅站在他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高度所提出的一些文化的基本命题，仍是当今文化革新的主要内容。而且，处于文化转折时期的鲁迅所表现出的一些基本文化态度，对于同处于文化转折时期的现在，仍有着极具参考意义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典型意义还在于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久远的



影响。

(二) 对待中外文化传统的基本态度

在鲁迅的一些基本的文化态度中,首先应引起重视的是他对待中外文化的态度。这是任何一个处于新旧文化转换期并立志促成这种转换的人都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

鲁迅这一代人都曾被这一问题困扰过。自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西方文化在愈来愈大的规模上撞击着中国。但这种撞击,不是出于中华民族的自觉自愿(不像中国历史上的盛唐时代,盛唐文化曾在强大的国势之下,气度雍容地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撞击,并通过对外来文化的自觉自愿的融合达到自身的超越),而是在丧权辱国的处境中被迫接受的。这一历史特点在中国人的心灵上投下了浓重的民族危机感和文化危机感的阴影。中国人从“宇宙中心”、“老大帝国”的幻梦中惊醒了,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对时时沉醉于其中的几千年文化的优越感开始产生怀疑,因为在许多文化领域中,中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首先表现出来了一种对于中国可能面临亡国灭种的灾难的历史焦灼感,他们继而对民族自身的文化进行严肃反省。自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们的脑中始终萦回着的问题就是:西方强盛、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什么是根本的民族复兴之道?这些问题集中到文化层面,人们的思考中心则是如何对民族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问题。浓重的文化危机阴影使许多知识分子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常常走向两种极端,一种是对民族文化彻底失去信心,企冀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另一种是缺乏对西方文化汲取、融合的能力和信心,试图以排斥外来文化影响来单方面振兴民族文化。这两种设想基本上都是行不通的。文化系统的形成,根源于特定民族的特定历史过程,文化会随历史的变迁而变迁,但完全以植根于别的区域、别的种族、别的历史过程的文化系统来取而代之,是



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企冀以西方文化完全取代中国文化,这样的设想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但实际上却难以实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惰性力,使整个文化系统呈现出超稳定结构状态,如果不借助外力的冲击,仅从自身找寻根本变革的出路,试图排斥外国文化影响,关起门来单方面地振兴民族文化,这显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在 20 世纪初人们对西方文化挑战的种种反应中,鲁迅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鲁迅很早就提出了一种充满进取精神的文化构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①这可以看作鲁迅在 20 世纪初面对西方文化挑战所采取的总体态度和对民族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基本构想。鲁迅认为,对民族文化固有的血脉,在不失其信心的前提下,应加以辨析、扬弃和选择;对世界文化思潮,则在打破闭关锁国状态的基础上,应以积极的态度去占有、挑选和拿来;在这两条途径相辅相成的结合中,去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这一基本构想出发,形成了贯穿鲁迅一生的中外文化观:对中华民族文化中优化因素(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结构功能之后)的传承以及对外来文化中先进文化因素的“拿来主义”。这充分显示了鲁迅崇高的情怀和开放的胸襟。鲁迅的这种文化构想在 20 世纪初有其代表性,正是鲁迅这一代文化人,通过这两条相辅相成的途径,架通了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世界文化进步思潮之间的桥梁。

鲁迅在深刻的文化反省中,始终坚持“全面反传统”的精神;这应该看作他对上述文化构想的合理发展。“全面反传统”在鲁迅那里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口号。鲁迅目睹了中华民族两度失去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的机会:一次是戊戌变法失败,失去了走日本明治

^①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56 页。

维新道路的机会；一次是辛亥革命后的政局逆转，失去了走法、美民主共和道路的机会。痛定思痛之后，他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与文化进步对于中国来说竟是如此的艰难曲折？鲁迅深刻地认识到，衰老的国度“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①。这种历时数千年的文化沉积，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历史惰力，即畸形的民族文化同化力，使得任何先进的东西都或遭到拒绝或被同化，改变成能适应于维系旧事物生命的东西。这种惰性严重阻碍着中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取优补劣。因此，鲁迅觉得，只有在整体格局以及整个体系上的全面反传统，先进的东西才会被真正接受过来，并充分发挥其效能。当然，鲁迅并非看不到中国文化的长处，但在他看来，多讲本国的优点容易使人陶醉，不思改进；而对弱点的批评，则能促人觉醒，激起人们改变现状的热情。鲁迅并不反对在打破传统文化的整体格局之后，对那些局部的、具体的积极性文化因素的传承和汲取。这里，正体现了民族自强精神与民族自我批判精神的高度统一。

站在文化转换的历史关头，人们无疑都会遇到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问题。能否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对于能否推动这种文化转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鲁迅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他所取得的诸多文化业绩，在较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他的这种对待中外文化关系的正确态度。这种态度对于同样处于文化变革历史关头的当代中国人来说，其借鉴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三）文化革新的主攻方向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诸多文化层次中所选择的文化革新的主攻方向。

^① 鲁迅《华盖集·十四年的“经验”》，《鲁迅全集》第3卷，第130页。



就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基本的历史使命是促进中国民族文化向现代化方向的转换。但在广阔的文化领域中，这种转换首先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在鲁迅之前的一些新派人物中，较为关注的是两个方面，即物质文化方面和制度文化方面。一部分人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乃在于物质文明的发达，因此，中国文化的转换，关键也在物质文化方面；于是，他们纷纷“竞言武事”，热衷于“制造商估”等等（如洋务运动的提倡者们，其后出现的实业救国论者实亦继承了这一思路）。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西方的强盛在于社会民主政治，因此中国文化的转换，关键是在制度文化方面；于是，他们纷纷“以众治为文明”，热心于“立宪国会之说”等等（如主张“维新”，热心“共和”）。然而，鲁迅却提出了与此不同的看法。他明确指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物质文明、民主政治等等，“此特现象之末”。也就是说，鲁迅认为西方强盛之根本在于人自身，在人自身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至于物质文明和民主制度等等，都是在人自身精神文明发达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的。如果片面强调物质文化和民主政治，而忽略人的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个首要因素，则无异于舍本求末。事实也一直在证明着这一点。高度的物质现代化，如果没有具备高度现代化精神文明的人去掌握，就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现代化物质文明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二是高度的物质文明为愚昧所用，助长了野蛮、落后与丑恶。至于民主政治，也必须由具有民主意识的人去掌握，否则民主政治终会落入少数人的掌握之中。鲁迅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转换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在主体精神文化方面，即应注重人自身的精神文化变革。用鲁迅的话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①。这里所谓的“立人”，其内容主要是指人的个性

①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57页。



意识的自觉和人的精神的张扬。鲁迅极力倡导这种主体精神文化的建设,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眼的:第一,鲁迅是从西方文化发展的历程着眼的。西方文化的突转性发展是始于人的觉醒;西方近代文化与中世纪专制主义文化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正如马克思所说,封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使人真正摆脱中世纪桎梏的唯一途径,便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①。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的解放运动,没有对主体精神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则很难想象会有后来那样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第二,鲁迅是从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着眼的。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传统的中国,对于人的价值的贬抑,个性的压制,思想的束缚,远比欧洲封建国家为甚。基于以上两个方面,人的价值的强调,重视人本身精神文化的建设,这对于冲破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对人们的精神束缚,对于唤起民族自觉,对于创建一种迥异于封建旧文化的民族新文化,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与倡导主体精神文化建设相联系,鲁迅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并思考了“改造国民性”这一历史命题。“改造国民性”命题的提出,对清理封建专制文化在社会心理中的历史沉积、促进人的现代化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他在对各具体文化领域进行反省时,都无一例外地涉及到了国民性问题。诚如我们在本书中将分析到的,在伦理文化批判中,鲁迅挖掘了中国人身上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根性的文化根源;在谈语言文字问题时,鲁迅也未忘记透过语言现象揭示中国人的落后文化心理;在剖析宗教问题、民俗问题时,也总是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7页。



与揭示中国人性格中潜隐的落后面相联系。这里值得强调的是,鲁迅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健康的文化态度:敢于直面现实,正视民族弱点,敢于触及为一般人所忌讳的中国人性格中的隐秘之处。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光彩夺目的一页。对于现今的中国来说,鲁迅所揭示的种种国民性弱点中的有些方面也许已成为历史,但鲁迅重视主体精神文化建设的做法,却不能说对今人无启发。在当前的改革中,我们不也曾陷入改革的主攻方向(诸如生产力水平问题、体制问题、精神文明问题等等)问题的纷争?历史已经比鲁迅的时代更跨进了一步,我们有时间从容地、更全面地考虑问题,而鲁迅所提供的历史思考,对我们无疑仍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当我们反复看到一些诸如高度现代化设备引进后产生不了高效率,先进的物质文明在中国却与传统迷信发生嫁接等等社会现象时,我们不能不惊叹于鲁迅将人的现代化作为文化革新主攻方向所具有的文化战略眼光。

(四) 对整体文化发展的全局性眼光

在鲁迅的文化态度中,对文化发展始终坚持采用的“全局性”眼光,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鲁迅在各具体文化领域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也好,提出建设性主张也好,他的出发点都在于整体的中国文化的革新和发展。诚如我们将在本书中分析到的,当他从事艺术活动时,他的考虑并非从纯粹的艺术出发,而是从有助于文化进步着眼,并不惜为之作出种种自觉的牺牲(例如文艺创作中的“非艺术化”倾向);当他谈论语言问题时,他的思路却不在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从文化革新的迫切性出发,喊出了“消灭汉字”的偏激之论;当他涉及伦理文化问题时,他从整体文化进步的需要出发,将传统的伦理道德说得一无是处,等等。这种对于文化的“全局”眼光,使鲁迅的文化思考真正具有了文化史的价值。离开了文化发展史的尺度,我们往往难以对之作出中肯的评价。人们可以